

拂晓，天阴沉沉的，乌云密布，阴冷的空气预示着一场大雪即将来临。女用人走进屋里，一个小孩正在里头酣睡。她拉开窗帘，机械地望了一眼对面的房子——一幢有门廊的灰泥房子，然后走到小孩床边。

“菲利普，醒醒。”她说。

她掀开被窝，把他抱起来，带他下楼。孩子依然睡眠惺忪。

“你母亲找你。”她说。

她打开楼下一个房间的门，把小孩带到一张床上，床上正躺着个妇人。她就是孩子的母亲。她伸开双臂，小孩紧紧地依偎在她身边。他没有问为什么被喊醒。妇人吻着他的眼睛，用一双瘦削、纤细的手隔着他那件白法兰绒睡衣抚摸着温暖的身躯，将他搂得更紧了。

“宝宝，你还困吗？”她说。

她的声音很弱，好像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似的。小孩没有回答，但惬意地笑了。在这又大又暖和的床上，还有柔软的双臂抱着他，他感到很高兴。他蜷着身子，紧贴着母亲，想把自己缩得更小一点，并且睡意蒙眬地吻了她一下。不一会儿，他合上眼，又睡着了。大夫走过来，站在床边。

“喂，请先不要把他抱走。”她呻吟道。

医生严肃地看着她，没有答话。妇人知道孩子不允许在这儿久待，就又吻了他一下。她的手顺着他的身躯抚摸下来，一直摸到他的脚；她把他的右脚握在手里，抚弄着那五个小脚趾；然后，又慢慢地把手伸到左脚上。她呜咽起来了。

“怎么啦？”大夫说，“你累啦。”

她摇摇头，说不出话来，眼泪扑簌扑簌地往下掉。大夫俯下身子：“我来把他抱走。”

她太虚弱了，无力违拗大夫的意愿，只得让他抱走了。大夫将他交给保姆：“你最好把他放回他的床上去。”

“好的，先生。”

小男孩被抱走了，他还睡着。这时，孩子的母亲伤心地哽咽起来。

“他以后会怎么样呢？可怜的孩子。”

产褥护士想安慰她，但不久，由于她精疲力竭，哭声停止了。大夫走到房间另一端的一张桌子旁，桌上躺着一个死产的婴儿，用一条毛巾蒙着。他掀开毛巾看了看。大夫和妇人那张床中间隔着屏风，但妇人猜出了他正在干什么：

“是女的还是男的？”她低声问护士。

“又是个男孩。”

妇人不再吭声了。过一会儿，保姆回来并走近病榻。

“菲利普少爷一直睡着。”她说。

一阵沉默，大夫又按了按病人的脉搏。

“眼下我用不着在这儿了，”他说，“早饭后我再来。”

“我送你出去，先生。”保姆说。

他们默默地下楼，到了门厅，大夫收住脚步。

“你已派人请凯里太太的大伯了，是吗？”

“是的，先生。”

“你知道他什么时候到吗？”

“不知道，我正在等电报。”

“孩子怎么办？我想他最好离开这儿。”

“沃特金小姐说要带他走，先生。”

“她是谁？”

“孩子的教母，先生。你看凯里太太还能好吗？”

大夫摇了摇头。

一星期以后，菲利普坐在翁斯洛花园街沃特金小姐家的会客室的地板上。只有他一个是小孩，他习惯自己玩耍。房间里充塞着家具，每条长沙发有三个坐垫。每张扶手椅也有一个坐垫，他把这些统统地搬过来，借助几张轻便、易于搬动的镀金靠背椅筑了一个灵巧的洞穴。他可以把自己藏在“洞”里，不让潜伏在帘子后面的红印第安人看见。他将耳朵贴近地板，倾听水牛群在大草原奔跑的声音。不久，听见门开了，他屏住呼吸以便不被发现。但是，一只有力的手拉开一张椅子，坐垫便纷纷落下。

“你这淘气鬼，沃特金小姐要生气的。”

“你好呀，埃玛！”他喊道。

保姆弯下身去吻他。然后拍打坐垫的灰尘，将它们一一放回原处。

“我要回家吗？”他问。

“是的，我是来接你回去的。”

“你穿上了新衣裳！”

这是1885年。她穿着裙撑，她的长袍是黑丝绒的，窄袖、斜肩。裙子上饰有三个大荷叶边，头上戴着鹅绒饰带的黑色女帽。这时她犹豫着，因为她所期望的问题孩子没有问，她不能按事先准备好的话回答。

“你不想向你妈妈请安吗？”她终于说。

“哎呀，我忘了，妈妈身体好吗？”

这下她心中有数了。

“你妈妈身体很好，也很快乐。”

“哦，我很高兴。”

“你妈妈已经去了，你再也见不到她了。”

菲利普不懂得她的意思。

“为什么？”

“你妈妈上天堂了。”

她开始哭开了，菲利普虽然还不大明白，也跟着哭了。埃玛是个身材高大的女人，金黄色的头发，宽阔的面容。她是德文郡人，尽管她在伦敦帮佣多年，但仍乡音未改。眼泪更激起了她的情感，她把这孩子紧紧地搂在怀里，同时依稀觉得这孩子可怜，因为他被夺走了世间唯一没有私心的母爱。现在，只好把他交给陌生人，这太可怕了。过了一会儿，她重新恢复了平静。

“你伯父威廉在家里等着见你呢，”她说，“去向沃特金小姐道别，我们就回家了。”

“我不想说再见。”他回答说，本能地不想让人看到自己在哭鼻子。

“那好，上楼拿你的帽子去。”

他取了帽子，下楼时埃玛已经在门厅等候了，他听见了餐厅后面的书房里有人谈话，便停了下来。他知道沃特金小姐和她姐姐正和朋友谈话。他才九岁，就似乎感到要是他闯进去的话，她们准会替他难过的。

“我想还是应该和沃特金小姐说声再见。”

“你最好去说一声。”埃玛说。

“你先进去告诉她们一下。”他说。

他想充分地利用这次机会。埃玛敲敲门，走了进去。他听到她说：“菲利普少爷想和你道别，小姐。”

谈话突然停了下来，菲利普一瘸一拐地走进去。亨里厄特·沃特金是个健壮的女人，脸色红润，染了发。当时染发是要引起闲话的。记得教母刚改变头发颜色时，他在家已听到过许多闲话。她和姐姐住在一起。她姐姐已乐于天命，安度晚年了。另外两位来访者是菲利普不认识的太太，她们好奇地打量着他。

“我可怜的孩子。”沃特金小姐说道，张开了双臂。

她呜呜地哭开了。菲利普现在懂得为什么她没有进去吃午饭，为

什么她穿一身黑衣服，泣不成声。

“我得回家了。”菲利普终于说道。

他从沃特金小姐怀里挣脱出来，她又亲了亲他。然后他又去向她姐姐告别。一个陌生太太问可不可以吻他，他郑重其事地点头同意。虽然他哭了，却因自己激起这么大的哀恸而感到高兴。他本想再逗留一会儿以引起更多的同情，然而又觉得她们希望他启程，便推说埃玛正等着他，走出了房间。埃玛已下楼，正和地下室一个朋友谈话，他就在楼梯平台等她，还听到亨里厄特·沃特金说：

“他母亲是我最好的朋友，想起她的去世，真使我受不了。”

“你本不该去送葬的，亨里厄特，”她姐姐说，“我知道你去了会伤心的。”

接着，一个陌生的太太说：

“可怜的孩子，你想他在世界上孤苦伶仃的，太可怕了，我看到他还跛脚呢。”

“可不是，他有只脚天生畸形，他母亲对此十分发愁。”

埃玛回来了。他们雇了一辆小马车，埃玛把地址告诉了车夫。

3

他们来到凯里太太去世的那所房子，它坐落在肯辛顿诺丁希尔门和海斯特里特大街之间的一条僻静、体面的街上。埃玛把菲利普领进客厅。他伯父正在给已送来花圈的人写感谢信，有个花圈因没赶上出殡，还搁在门厅桌上的一个纸板箱里。

“菲利普少爷来了。”埃玛说。

凯里先生慢慢地站起来和孩子握了握手，然后，想了一下，又弯下腰吻吻孩子的前额。他中等身材，已开始发福了，长长的头发往后梳，借以盖住头顶秃去的部分。胡子刮得精光，五官端正，可

以想象他年轻时是英俊的。他的表链上还挂着一个金十字架。

“现在你要和我住在一起了，菲利普。”凯里先生说，“你愿意吗？”

两年前，菲利普出了水痘后，也曾被送到那儿，但那地方给他留下的记忆，与其说是有伯父和伯母，倒不如说只有一间顶楼和一座大花园。

“愿意。”

“你必须把我和你路易莎伯母看作自己的父母。”

孩子的嘴巴有点打战。他红着脸，没有回答。

“你亲爱的母亲把你托付给我照料了。”

凯里先生不善辞令，当获悉弟媳临终时，他马上赶来伦敦，一路上不考虑别的，光想假如她的去世迫使他肩负起照顾她儿子的重任的话，将给他的生活带来麻烦。他已年逾半百，结婚也已经三十年，但妻子不生育。他不期望家里突然冒出一个小男孩来，说不定还是个吵吵闹闹、粗野无礼的孩子呢。再说他对这个弟媳从来就没有什么好感。

“明天我要领你去布莱克斯特伯尔。”他说。

“和埃玛一道去吗？”

孩子把一只手放进埃玛手里，她将它紧紧攥住。

“恐怕埃玛得离开你了。”凯里先生说。

“我要埃玛和我一起走。”

菲利普“哇”的一声哭开了，埃玛也忍不住哭了。凯里先生无可奈何地看着他们。

“我想，最好让我和菲利普少爷单独待一会儿。”

“好的，先生。”

尽管菲利普抱住她，她还是轻轻地挣脱出来，凯里先生把孩子放到自己的膝上，搂住他。

“别哭，”他说，“你已经不小了，可以不用保姆了，我们得设法送你上学呢。”

“我要埃玛和我一起走。”小孩重复道。

“那太花钱了，菲利普，你父亲没有留下多少钱，不知道现在还剩多少呢。每花一分钱都随便不得。”

凯里先生前天还拜访了家庭律师。菲利普的父亲是个有名的外科医生，他在医院里担任的各种职务，表明他在医学界颇有地位。因此，当他因血液中毒猝然去世，人们发现他给妻子留下的财产不外乎他的人寿保险金和出赁他们在布鲁顿街的房子所能收到的房租时，都感到意外。这是六个月前的事。凯里太太当时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又发现自己怀孕，一时不知所措，一有人要租那幢房子就答应了。她把自己的家具堆藏起来，去租了一套牧师大伯认为非常昂贵的带家具的房子达一年之久，心想这样在孩子出世之前事事就顺顺当当了。然而她不善理财持家，开支不能和已改变了的家境相适应，这也花一点，那也花一点，以至如今，所有的开支付清之后，只剩下两千多磅，孩子在独立谋生之前，就靠这笔钱维持生活。现在要把这一切都解释给菲利普听是不可能的，他还在哭泣呢。

“你还是找埃玛去吧。”凯里先生说。他觉得她比任何人都更能抚慰这孩子。

菲利普二话不说，迅速地从伯父的膝上滑下来，但凯里先生又喊住他。

“我们明天必须动身，因为星期六我得准备布道。你得告诉埃玛，今天把你的东西收拾好，你可以把玩具都带走。如果你想要点父母的遗物作纪念，可各带一件，其余的东西都要卖掉。”

菲利普溜出了房间。凯里先生不习惯伏案工作，现在又怀着一肚子怨气继续写感谢信。桌上的另一边有一叠账单。这些账单使他特别恼火。有一张显得特别荒唐。凯里太太刚死，埃玛立即向花店订购了大量白花，用来布置停着遗体的房间，这纯属浪费金钱。埃玛太自作主张了。即使不是考虑经济上的拮据，他也要把她解雇。

菲利普却赶紧去找她，一头扑到她的怀里，哭得非常伤心。埃

玛拿温柔的话来安慰他。菲利普刚满月就由她照料，她觉得他几乎是自己的孩子。她答应有空会来看他，说她永远不会忘记他。她告诉他所要去的乡村以及德文郡老家的情况：她父亲在通往埃克塞特的公路上管理一个通行税征收所。猪圈里有好几头猪；还有一头奶牛，这头奶牛刚生下一头小牛犊。听着听着，菲利普竟忘了哭泣，想到临近的这趟旅行，渐渐地兴奋起来了。然后，她把他放下来，因为她还有许多事要办。他帮她把自己的衣服摆在床上，又听从她的吩咐，到育儿室收集自己的玩具。过了一会儿，他已高高兴兴地玩开了。

最后，他自己玩腻了，又回到寝室去，埃玛正将他的东西装进一只大铁皮箱。这时，他才记起他伯父说过，他可以拿一些父母亲的遗物留念。他告诉埃玛，问她应该挑选什么。

“你最好到会客室去，看看你喜欢什么东西。”

“威廉伯伯在那儿。”

“那没关系，现在那些是你自己的东西了。”

菲利普慢慢走到楼下，发现门正开着，凯里先生已离开房间，菲利普慢慢兜一圈。他们在这所房子的时间太短了，因此这儿没有什么东西使他特别感兴趣。这是陌生人的房间，菲利普看不出有吸引他的东西。但他知道哪些是母亲的遗物，哪些是房东的东西。突然，他眼光落在一个小钟上，他曾听母亲说她喜欢它。他拿着这个钟，闷闷不乐地上楼去。到了母亲寝室的门口，他止步倾听。虽然没有人叫他不能进去，但总觉得进去是不对的。他有点害怕，心怦怦直跳。同时，某种感情驱使他去扭开门把手。他轻轻地拧动门把，好像生怕里面的人听到似的，他慢慢将门推开。在没有勇气进去之前，他先在门口站了一会儿。他现在不害怕了，但这儿似乎有点陌生。他随手将门关上。百叶窗关着，在一月午后清冷的阳光下，屋里显得很昏暗，凯里太太的梳妆台上放着发刷和手镜。一只小盘里放着发针，壁炉架上放着一张他自己的照片和他父亲的照片。以往母亲不在房间时，他也常

在这房间，可现在似乎有点异样，椅子的样子也有些特别。床铺得好好的，像是当晚有人要在那里睡觉似的，枕头上有一只套子，里面还放着一件睡衣。

菲利普打开一个装满衣服的大衣柜，一脚跨进去，张开双臂，尽可能多地抱一抱衣服，将自己的脸埋进这堆衣服中。它们还散发着母亲用过的香水味。然后，他把抽屉统统打开，里面塞满了母亲的东
西，他望着这些东西：衬衫中夹有熏衣袋，香气袭人。房间的陌生气氛消失了。他仿佛觉得母亲刚出去散步。她马上就会回来，而且会上楼和他一块用茶点。他依稀可以感觉出母亲印在自己嘴唇上的吻。

他再也见不到她了。这不是真的，这怎么可能呢！他爬上床去，将头靠在枕头上，一动也不动地躺在那儿。

4

菲利普和埃玛挥泪告别。但前往布莱克斯特伯尔的旅行使他高兴。当他到那儿时，他已随遇而安，且兴致勃勃。布莱克斯特伯尔离伦敦六十英里，把行李交给脚夫之后，凯里先生和菲利普一起步行到教区牧师住宅。他们走不到五分钟就到了。菲利普一下记起了那个门。门是红栅栏门，上面有五根栅栏，装有活动铰链，可向里向外开关，人吊在栅栏上可以前后摆动，只是不允许这样玩。他们穿过花园走到正门。这扇门只有来了客人或者星期天，或者特殊场合，例如当牧师上伦敦或从伦敦回来时才使用。平时使用边门。同时还有一个后门专供园丁、乞丐及流浪汉出入。这一幢房子相当大，黄砖、红顶，大约二十五年前以教堂建筑物的风格盖的。正门就像教堂的门廊，客厅的窗子是哥特式的。

凯里太太知道了他们是乘那趟列车来的，在客厅等候，留神开大门的咔嚓声。门一响，她就马上迎出去。

“那是路易莎伯母，”凯里先生看到她时说，“跑过去吻她一下。”

菲利普听话又非常别扭地拖着畸形脚跑过去。他跑了几步，又停下来。凯里太太和丈夫同龄，瘦小身材，脸上布满着很深的皱纹，长着一双淡蓝色的眼睛。灰色的头发仍按年轻时的式样梳成一绺绺的小发卷。她穿一身黑衣服，一条金项链是她唯一的装饰，链上挂着一个十字架。她生性羞怯，说话声音柔和。

“你们步行回来的吗，威廉？”她一边吻着丈夫，一边以近乎责备的口吻说。

“我没有想到这一点。”他回答，同时望了侄儿一眼。

“走路不碍事吧，菲利普。”她问孩子。

“我经常走路。”

他对他们的谈话感到有点奇怪。路易莎伯母招呼他进屋，他们进入门厅。厅里铺着红黄相间的花砖。花砖上交替印有四臂等长的十字架图案和耶稣画像。堂皇的楼梯直通门厅。这楼梯是用磨光的松木制成的，有一股特殊的气味。这些松木是给教堂安装新座位时剩下的木料。栏杆上装饰着象征四个《福音书》的著者的寓意图案。

“我已叫人把屋里的炉子生好了，我想你们旅行后会感到冷的。”凯里太太说。

摆在门厅的是个黑色的大火炉，只有当天气很冷，牧师又患感冒时才生炉子。凯里太太感冒是不生炉子的。煤很贵。此外，女仆玛丽·安不喜欢到处都生炉子。要是他们想把所有的炉子都生着了那就得再雇个女仆。冬天，凯里夫妇住在餐室，生一个炉子就够了。

夏天他们也改变不了这一习惯，仍住在餐室。因此，客厅只供凯里先生每星期下午午睡用。但每星期六他书房得生炉子，以便他写布道。

路易莎领菲利普上楼，让他看一间正面对着车道的小寝室。窗子前面有棵大树。菲利普现在记起来了，这棵树的树枝很低，因此可顺这些树枝爬得很高。

“小孩住小屋，”凯里太太说，“你独个儿睡不害怕吧？”

“不怕。”

他第一次上这儿时是和保姆一道来的，因此凯里太太不用为他操什么心。现在她看着他，心里有些放心不下。

“你自己会洗手吗？要不要我替你洗？”

“我自己会洗。”他坚定地回答。

“好，你下楼用茶点时我要检查你的手。”凯里太太说。

她对照料孩子的事一窍不通，决定送菲利普到布莱克斯特伯尔时，凯里太太对如何照料他想了许多。她急于想尽到自己的责任。现在他来了，她却和他一样地羞怯。她希望他不吵闹，不粗野，因为她丈夫不喜欢这样的孩子。凯里太太找了个借口，把菲利普独自留在楼上，过一会儿，她又来敲门，在门外问他能否自己倒水，才放心地下楼按铃吩咐仆人上茶点。

餐室既宽敞又匀称，两边都有一排窗户，挂着沉重的红色棱纹平布窗帘。中间有张大方桌。另一头有一个显眼的装有镜子的红木餐具架。餐室的一角竖着一架小风琴。壁炉的两旁都摆着两张皮椅，皮面上盖有商标印戳，椅背上都罩有椅套。有扶手的被称为“丈夫椅”，没有扶手的被称为“妻子椅”。凯里太太从未坐在那张扶手椅上。她说她宁愿坐一张不太舒服的椅子，每天总有很多事要做，要是她的椅子也有扶手，坐起来舒服，她担心一时会舍不得离开的。

菲利普进来时，凯里先生正给炉子添煤。他对侄儿说，那两把火钳，其中一把又粗，又光又亮，未使用的，称为“牧师”；另一把细得多的、明显经常用来拨火的称为“副牧师”。

“我们还等什么呢。”凯里先生说。

“我让玛丽·安给你煮个蛋，我想你一路辛苦，一定饿了。”

凯里太太认为从伦敦到布莱克斯特伯尔一路上会很累，她自己很少出门，因为每年只有三百磅收入，丈夫想到外地度假时，两个人的费用不够，就他一个人去了。他非常喜欢出席全国基督教大会，通常设法每年到伦敦一次。有一次他曾到巴黎参观展览，还到过瑞士两三

次。玛丽·安端来鸡蛋，大家入席就座。

菲利普的椅子太矮了，凯里夫妇一时都不知所措。

“我给他垫几本书。”玛丽·安说。

她从小风琴上取下那本大开本的《圣经》和牧师祷告时经常用的祈祷书，把它们放到菲利普的椅子上。

“哎呀，威廉，他不能坐在《圣经》上。”凯里太太说，“你不会到书房拿一些书来吗？”

凯里先生对这问题考虑了一会儿。

“我想，就这一回把祈祷书放在下面也没多大关系，玛丽·安，”他说，“英国国教祈祷书也是像我们一样的凡人写的，称不上是神圣的作者。”

“这我倒也没想到，威廉。”路易莎伯母说。

菲利普坐在这两本书上。牧师做完祷告，就将鸡蛋的尖头切下来。

“给，”他说，将蛋的尖头交给菲利普，“要是你喜欢的话，就把这块蛋尖吃了。”

菲利普巴不得自己吃一个蛋，但牧师没给他，只好给什么就拿什么。

“我不在家的時候，鸡一直下蛋吗？”牧师问。

“唉，太糟了，每天只有一两只鸡下蛋。”

“鸡蛋的尖头味道怎样，菲利普？”伯父问。

“很好，谢谢你。”

“星期天下午你还可以再吃一块。”

凯里先生星期天用茶点时总要吃个煮蛋，这样在晚礼拜时才更有劲。

5

菲利普渐渐地熟悉了伯父家的情况，并且，通过他们平日交谈的片言只语——有些并非有意要说给他听的，他获悉许多关于自己和已故的双亲的情况。菲利普的父亲比布莱克斯特伯尔的牧师年纪小很

多，在圣卢克医院有了显赫的经历之后，他被聘为该院的正式职员，不久便开始有了大笔的进款。他花钱随便。牧师着手修缮教堂向弟弟募捐时，出乎他的意料，接到了好几百磅的捐款。凯里先生省吃俭用惯了，手头也拮据，收到这笔钱他百感交集。他妒忌弟弟，因为他竟能掏出这么多钱；他为教堂有这笔捐款而高兴，却又为弟弟的这种近乎炫耀的慷慨所激怒。接着亨利·凯里和一个年轻漂亮、身无分文的病人结婚。她出身名门，却是个没有近亲的孤儿。婚礼上贵宾良朋云集。牧师到伦敦多次，拜访过她，对她总显得拘谨，甚至有些羞怯；对她惊人的美貌、端庄心怀怨恨。作为一个勤勤恳恳的外科大夫的妻子，她的穿戴未免过于华丽。屋里陈列着精致考究的家具，甚至冬天了，还生活于繁花之中，这说明她太奢侈了，他对此感到痛心。他听她谈到准备参加的各种宴会。牧师回家后告诉妻子，既然她接受了人家的款待，总得作些回请。他看到她餐厅里摆着的葡萄至少每磅得花八先令。午餐时，她招待他的芦笋比自己菜园里的要早两个月，如今他所预料的一切都成了现实。牧师感到预言者的心安理得。这个预言者早就看出一场大火和硫黄将烧毁这座不听自己警告、一意孤行的城市。可怜的菲利普基本上一分钱也没有，而他母亲那么多亲朋好友现在又管什么用呢？菲利普听到议论，说他父亲的挥霍确实是罪过，上帝让他母亲归天这真是大慈大悲。她对金钱的无知，还不如小孩呢！

菲利普在布莱克斯特伯尔待了一星期后，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使伯父非常恼火。一天早晨，他在餐桌上发现一件从伦敦已故的凯里太太寓所寄来的小邮包。它是寄给凯里太太的。牧师打开一看，发现有凯里太太的一些照片。这些照片只照了头部和肩部，她的发式比平常朴素，云鬓垂在额前，看起来有些异常。脸显得瘦削、憔悴，但疾病并没有损害她容貌的俏丽。一双黑色的大眼睛充满着忧伤。这种神情菲利普记不起来了。凯里先生见到这个已离开人间的妇人的照片先是心里为之一震，接着又感到困惑不解。照片看起来是新近才照的，但他想不出究竟是谁让照的。

“这事你知道吗？菲利普。”他问。

“我记得妈妈说，她照过相，”他回答，“沃特金小姐为此还责怪她……妈妈说，我想给孩子留点什么，让他长大了能够记住我。”

凯里先生瞧了菲利普一会儿，孩子讲话的声音尖细清晰。他回忆着母亲说过的话，却不解话中之意。

“你最好拿一张照片挂在你的房间里，”凯里先生说，“其余的我都要收起来。”

他也给沃特金小姐寄去一张照片，她的回信揭开了这些照片之谜：

一天，凯里太太正躺在床上，觉得身体比平常好了一点，早上大夫也觉得病情似乎有了转机。埃玛将孩子带出去了，女仆们都在地下室。突然间，凯里太太感到自己在世间非常孤单。不出两周她就要分娩了，她极害怕无法在分娩后恢复健康。她的儿子才九岁，怎样才能使他记住她呢？一想起她儿子将长大成人，但会忘记自己，忘得一干二净，她简直受不了。她之所以这样深情地疼爱他，是因为他很瘦弱，又有残疾，也因为他是自己的骨肉。结婚十年来，她还没有照过相。她要让儿子知道自己临终前的模样，那样他就不会忘记她了，至少不会忘得一干二净。她知道，要是把女仆唤来，说自己要爬起来，那么女仆定会阻止她的，也许还会把大夫叫来，而她现在已没那种争辩、挣扎的力气了。她下了床，开始自己穿衣服。由于久卧病榻，双脚酥软，支撑不住身体，脚板痛得不敢踩下去，然而她咬牙挺住了。她不习惯自己梳头，当她抬高手臂梳头时，感到一阵昏眩。她不能梳成女仆梳的那个样式。一头秀发非常细软，呈鲜艳的金黄色。她穿上一条黑色的裙子，却又挑选一件她最喜欢的晚礼服紧身胸衣：这是白缎子做成的，这种料子当时很时髦。她照照镜子，脸色很苍白，皮肤却非常白洁。她脸上向来没有多少血色，因此，美丽的嘴唇反而显得红润了。她忍不住呜咽起来。但她已经顾不得为自己难过，她精疲力竭了。她穿上前年圣诞节亨利送给她的皮衣——她当时是何等的骄傲和高兴——溜下楼去，心怦怦直跳。她总算平平安安地出了门，叫了

一辆车来到照相馆，整整照了一打照片。照相时，她不得不要了一杯水喝才能挺住。摄影师的助手看到她病了，建议她改日再来。但她坚持照完。照相完毕，她又驱车回到了她打心里痛恨的肯辛顿这所昏暗的小屋。想到要死在这样的房子里，实在太可怕了。

车子一到了门口，她看见大门敞开着。女仆和埃玛都跑下台阶扶她。她们发现屋里没人时都吓坏了，起初以为她去找沃特金小姐，还派厨娘去找。沃特金小姐和厨娘一块回来了，在客厅焦急地等着。此时沃特金小姐也跑下楼来，满怀忧虑和责备。凯里太太经过这番折腾，已疲劳过度。需要硬挺的时刻一过去，她再也支撑不住了，一头栽倒在埃玛怀里，被抬上楼去。守护她的人似乎觉得她失去知觉的时间太长了，匆忙派人去请医生，但没有请来。第二天，她身体稍微好一点，沃特金小姐才从她嘴里了解到事情的原委，恰巧，菲利普正在母亲寝室的地板上玩，她们谁都没有注意到他。她们所谈的他并不十分明白，他也说不出为什么这些话竟会留在自己的记忆里。

“我要给孩子留点他长大时能记起我的东西。”

“我不懂她为什么照了一打，”凯里先生说道，“两张足够了。”

6

在当牧师的伯父家里，日子过得千篇一律。

早饭后不久，玛丽·安拿来了《布莱克斯特伯尔时报》。这份报纸凯里先生和两位邻居合订的，从十点至一点归他看，然后花匠才把报纸拿来给莱姆斯庄的埃利斯先生，他可保留到七点。之后报纸又传到了马诺宅的布鲁克斯小姐手里，因为她最后拿到报纸，所以报纸就留在她那儿。夏天凯里太太做果酱的时候，常常向布鲁克斯小姐要一份报纸来盖这些坛坛罐罐。牧师一坐下来读报时，他妻子就戴上无边女帽，由菲利普陪着出去买东西。布莱克斯特伯尔是个渔村，镇上只有一条大街。街上有许多商店、一家银行，还有诊所及两三家煤船主。

而小港口周围就全是渔民和穷人居住的破烂不堪的小街道。因为他们上小教堂做礼拜，因而总被人瞧不起。凯里夫人在街上要是遇到那些非国教的牧师，总要走到街的对面去，避免和他们照面；有时来不及了就低着头，眼睛紧紧盯住人行道。在一条大街上竟设立了三个非国教徒的教堂，对于这件丑闻，牧师从未听之任之。他总觉得法律本来应该出面阻止它们的建立。在布莱克斯特伯尔买东西可不是件简单的事。鉴于教区教堂离城里还有两英里这一客观事实，不信奉国教者是很普遍的。因此，有必要专门与上教堂做礼拜的信徒打交道。凯里太太深知牧师光顾哪家商店，与商人的信仰关系极大。有两个做礼拜的肉商，他们不明白为什么牧师不能够同时与两个肉商做生意，他们对于牧师上半年到这家买，下半年又到那家买的这一简单的解决办法不满意。牧师不上哪家买肉，哪家肉商就常常威胁说他不上教堂做礼拜。牧师有时也针锋相对：他不做礼拜是非常错误的。但是，如果他错上加错，竟敢上非国教的小教堂做礼拜，那么，即使他的肉质量再好，凯里先生也只好和他断绝来往。凯里太太常常在银行停下来，给经理乔赛亚·格雷夫斯捎口信。他是教堂唱诗班的领班、出纳和教会执事。他瘦高个，灰黄色的脸，鼻子很长，头发全白了。在菲利普看来，他似乎很老了。他负责教区的账目，安排款待唱诗班及为学校办娱乐等事。虽然教区教堂没有风琴，他所带领的这个唱诗班却被公认是肯特郡最出色的。每当有什么仪式，譬如主教大人施坚信礼，乡村牧师感恩节来布道等等，他都得做必要的准备。他甚至连草率地和牧师商量都不要，就毫不犹豫地对各种事情包揽独断。牧师虽然主张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对这个教会执事办事的作风很不以为然。看来，他俨然以全教区最重要的人物自居。凯里先生常常对妻子说：假如乔赛亚·格雷夫斯不收敛点，还是一意孤行，有朝一日他要教训他一顿。凯里太太劝告丈夫对乔赛亚·格雷夫斯容忍点，说他并没有坏心眼，即使他称不上君子，那也不是他的过错。牧师以实践基督道德自慰，便采取了容忍态度。但是为了出气，他在背后老骂教会执事是

“俾斯麦”。

有一回这两个人吵得很凶。凯里太太一想到那情景还有些沮丧不安。事情是这样的，保守党候选人宣布要在布莱克斯特伯尔的大会上发表竞选演说，乔赛亚·格雷夫斯把演说安排在布道厅举行以后，才跑去找凯里先生，并且对他说，他也希望他在会上能讲讲话。看来候选人已要求乔赛亚·格雷夫斯主持会议了。这种越俎代庖的做法是凯里先生所不能容忍的，他认为牧师的职权理应受到人们的尊敬，这是不能含糊的。牧师在场，却让教会执事来主持会议，这未免太可笑了。他提醒乔赛亚·格雷夫斯，教区牧师乃是教区的至尊人物，也就是说在教区内牧师说了算。乔赛亚·格雷夫斯回答说，他头一个承认教会的尊严，然而这回纯属政治问题。他也提醒牧师，他们的圣主耶稣基督告诫他们“该撒的物当归该撒”^①。凯里先生也以牙还牙回击说，魔鬼也会引用《圣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本人在布道厅是唯一有权威的人，如果不请他主持，那他就拒绝在这地方召开政治性的会议。乔赛亚·格雷夫斯对凯里先生说，随他的便，并威胁说在他看来，在美以美小教堂召开也一样合适。随后，凯里先生说，假如乔赛亚·格雷夫斯跨入一个不比异教徒的神殿好多少的地方，那么他就不适合留在基督教区当执事。乔赛亚·格雷夫斯于是辞去一切圣职，并于当天晚上派人去教堂索取黑袍法衣和白色法衣。替他持家的妹妹，格雷夫斯小姐也同时放弃了产妇俱乐部的秘书职务。这个俱乐部给贫穷的孕妇提供法兰绒布、婴儿内衣、煤和五先令的救济金。凯里先生说他终于又成了一家之主了。但他立即发现他不得不过问起自己一无所知的各式各样的琐事。而乔赛亚·格雷夫斯心平气和之后，也发现失掉了自己生活的主要乐趣。凯里太太和格雷夫斯小姐对这次吵架感到非常苦恼。通过周密的书信来往，她们会面了，并决心调解好这场纠纷。她们一个找丈夫，一个找哥哥，日夜地调解劝和。由于她们规

^① 出自《新约全书》的《马可福音》第十二章第十七节。